

止于至善

傅佩荣谈大学 中庸

傅佩荣 著



『止于至善』一词出于
《大学》篇首开宗明义所
说的三纲领：『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想理解止
于至善的含义，就要在
《大学》与《中庸》中寻
找答案。

東方出版社

止于至善

傅佩荣谈大学 中庸

傅佩荣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止于至善：傅佩荣谈大学中庸 / 傅佩荣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9
(傅佩荣详说经典)

ISBN 978-7-5060-5318-1

I. ①止… II. ①傅… III. ①儒家 ②《大学》—研究 ③《中庸》—研究
IV. ①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3261 号

止于至善：傅佩荣谈大学中庸

(ZHIYUZHISHAN: FU PEIRONG TAN DAXUEZHONGYONG)

作 者：傅佩荣

责任编辑：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2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1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5318-1

定 价：36.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自序

“止于至善”一词出于《大学》篇首开宗明义所说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说清楚什么是止于至善，为何要止于至善，以及如何做到止于至善，就必须充分理解《大学》这部经典。

古代贵族子弟十五岁入“大学”，学习如何融入统治阶级的生活。《大学》这本书是从儒家立场说明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思想、修养方法，以及从政目标。其中所论“修养方法”部分，可以摆脱时代及社会的限制，彰显普遍而永恒的启示，帮助每一个人走上生命的康庄大道。

首先，为了明白“至善”，须先澄清什么是“善”。依儒家所说，“善”是一个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譬如，身为父母，要教养子女；身为国君，要照顾百姓；身为公务员，要尽忠职守；身为朋友，要讲求信义。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因此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是我们修养自己、成就人生的必经之路。以个人而言，至善是尽到自己在人际相处每一方面的职责；以社会而言，至善是最高领袖（天子）做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而能济众”。孔子认为这个目标是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至于孔子本人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也正是“止于至善”的具体实现。

其次，深入探索人为何要止于至善，答案则是因为“人性向善”。人只要真诚，就会由内而发，产生主动的力量，要求自己行善，使适当的人际关系得以实现。孔子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行仁需要自己主动；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须真诚自觉，才可付诸行动。孟子一贯地在“善”与“不善”前面，加一个“为”字，可见他认

定“善是具体行为”，人性只是向善，而不是朱熹所想象的“本善”。《大学》第四章谈“诚意”时，有一句“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小人平日就做不善的事，没有什么坏事不做的）。读到这样的语句，谁还能一厢情愿地宣称人性“本善”？

最后，如何做到止于至善呢？《大学》对现代人最大的意义，就是为大众提供了一套修养方法。从天子到百姓，全都要以“修身”为本。在“八条目”中，修身之前的四个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光是第一步“格物”，就形成难解之谜。朱熹认为它是指“穷究万物之理”，王阳明认为它是指“正其心于事物”。前者支离琐碎，无人可以做到；后者简易空洞，全靠自由心证。我们的理解如下：格物是指辨别与我有关的人与事；致知是指由此得知相关的善恶判断与行为规范，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诚意”与“正心”的功夫。接着所谓的修身，是指修养言行，正是要以善恶及规范为其准绳。这样的理解，才可由前到后“一以贯之”。

由修身开始，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观念在今日应做些调整。比如“治国”的“国”是指个人的行业与职责范围；“平天下”的“天下”是指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全部领域。修身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八条目也是永无止境的努力过程。

《大学》在本书中只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我们谈得更多的是《中庸》。如果《大学》算是大学本科生的教材，《中庸》就是研究生的课本了。儒家思想发轫于孔子，完成于孟子，应用于《大学》，结晶于《中庸》。《中庸》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聚焦于人的生命原貌与人生正途。人之道是择善固执，人之性是向善，联系两者的是“明善”与“诚身”。《中庸》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把人类与天地万物融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提出一系列让人“心向往之”的描述。人类在世间所能期望的最高境界无过于此，这明显也是另一种类型的“止于至善”。

儒家有过这么美妙的观点，不论它能否实现，至少我们要尽力学习并认识它的价值。

目 录

自 序 1

大 学

大学 第一讲 3
大学 第二讲 13
大学 第三讲 25
大学 第四讲 37
大学 第五讲 45
大学 第六讲 54
大学 第七讲 63
大学 第八讲 72

中 庸

中庸 第一讲 83
中庸 第二讲 94
中庸 第三讲 109
中庸 第四讲 117
中庸 第五讲 128
中庸 第六讲 138
中庸 第七讲 146
中庸 第八讲 158

中庸 第九讲	168
中庸 第十讲	181
中庸 第十一讲	184
中庸 第十二讲	194
中庸 第十三讲	206
中庸 第十四讲	216
中庸 第十五讲	230
中庸 第十六讲	234

大 学

大学 第一讲

古代有大学，相对的，也有小学。小学所教的是洒扫应对进退。每个小孩都会慢慢长大，在融入社会前必须在家庭、学校与别人相处，需要学习基本的生活规范，还有“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孔子小时候，念过乡村的学校，这是属于小学的范围，到十五岁就可以上大学了。但是大学并非每个人都能念，只有那些将来要当政治领导的贵族子弟以及民间的俊彦之士，也就是少数特别杰出的年轻人才能有这个机会。古代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让人受过大学教育之后能够做官，知道做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何种修养。所以一般人都知道《大学》有“三纲八目”，最后是要治国、平天下。

大家对于《大学》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耳熟能详，至于这本书的重要性何在？我先把它的背景大概说明一下。

《大学》的背景

古代有五经，《易经》、《诗经》、《书经》之外，还有《礼经》与《乐经》。《乐经》已经失传了，《礼经》包括三部分：《仪礼》、《周礼》与《礼记》。仪礼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各种仪式，包括男子二十岁加冠的冠礼、结婚的婚礼、丧礼与祭礼，还有同乡的人喝酒、读书的人见面等礼仪，这些都是仪礼的范围，细节非常琐碎。周礼是周朝的各种制度，三百六十行每一个行业都在内。但是时代递演之后，制度大多已经更改，所以《仪礼》和《周礼》，一般人不太能够理解，到汉朝时很多人已经弄不清楚，今天也很少有人去研究它们。《礼记》是把礼的精神，做比较完整的说明，反而流传了下来。

东汉的郑玄曾注解《礼记》，今天我们所读的《礼记》就是郑玄编注的。《礼记》分《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我们所读的是《小戴礼记》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中包含《大学》与《中庸》，所以它们是《礼记》里面的两篇文章。汉朝之后一直到唐宋的学者，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也没有特别重视它们。

宋朝时儒学和佛学都很发达，两者相比较可知，佛教的思想系统非常完备。佛教有几个大的宗派，从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唯识宗，一路到华严宗以及后来禅宗的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佛教的体大思精。而儒家的学说只用《论语》、《孟子》的格言与简单对话，无法和佛教复杂深刻的思辨相对抗，所以宋儒开始研究《大学》与《中庸》这两篇，并把这两篇抽离出《礼记》，独立成两本书。南宋时，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一本书，以“四书章句集注”六字作为书名，于是这四本书常以“四书”一词统指之。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这六字书名中所谓“章句”指的是《大学》和《中庸》，因为古代的书没有标点符号，朱熹把这两篇分章分句，并以自己的思想作注解，再加上他认为遗漏的章句；而书名中的“集注”则是把历代以来对《论语》、《孟子》的注解汇合起来。所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大学》、《中庸》以章句为主，大多是朱熹个人的解释；《论语》、《孟子》是集注，把各家注解合起来放在书中。编成之后，《四书章句集注》逐渐变成读书人的教科书，尤其是明朝之后实施的科举制度，都以朱熹这本书作为教材。原因之一是明朝的皇帝也姓朱，用自家人的书比较放心。但是这六百多年来，大家都念朱熹的章句集注，以为他的注解就是标准的解释，问题就产生了。

朱熹是一个哲学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历来都是学者注解六经，他却反过来用六经注解他的思想。在为“四书”做章句与注解时，处处表现他个人的见解。他认为讲解不够清楚的地方，就加上自己的看法。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他的人性分成两半，一半是天地之性，叫做“天理”，就是仁义礼智，这是善的；另一半是气质之性，因为人生下来有身体，

所以有各种特殊的气质，气质有清有浊，会产生遮蔽。人有“天理”作为本心，是善的；但气质会遮蔽与阻碍本心，所以人要学习把它去掉，让天理出现。他称此为“复其心”，也就是恢复个人的本心，这是朱熹的思想立场。但是如何去掉这种遮蔽呢？在《大学》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朱熹说《大学》可能是曾子所作，而《中庸》则是子思的作品。他认为孔子是儒家的第一代，《论语》记载了他的学说；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写了《大学》；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写了《中庸》；然后才是孟子，这样形成代代相传的系统。但这个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根据后代学者的研究，《大学》与《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而《礼记》一书是在秦汉之际编成的，也就是战国结束之后到秦朝、汉朝之间方才成书。也许书的材料是古代的，但经过研究，《大学》、《中庸》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比《孟子》更早。

生活在南宋的朱熹为了提高这两本书的地位，就提高了作者的辈分。更大的问题是他编四书时，《大学》排第一，《中庸》排第二，《论语》排第三，《孟子》排第四，这样的顺序让人无法接受。儒家应该是《论语》第一，《孟子》第二，就算《大学》是曾参写的，记录孔子主要思想的《论语》却排在第三，实在是没道理的。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就是说读完《大学》这本书，就知道怎么进入德行的世界修养自己，所以要放在第一，《中庸》第二，让“论、孟”放在后面。事实上《大学》与《中庸》两本书完全不同，《中庸》的内容很深刻，《大学》则较浅显，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特色。

回到古本《大学》

对于朱熹的做法，我们无法接受，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古本《大学》。为什么加上“古本”二字呢？因为《大学》被朱熹整理之后变成《大学章句》，我们说《大学章句》时，指的就是朱熹所作的；说古本《大学》，就代表《礼记》中的《大学》。为什么要重视古本《大学》？这里面有个故事。

明朝的著名学者王阳明，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他年轻的时候读朱

熹的书，认为朱熹是大学者，肯定说得有道理，就按照朱熹的做法去格物。他十八岁的时候格竹子，把竹子剖开来，研究了半天却生病了。他想，只是格竹子都生病了，如果这样去格万物，还有命吗？所以，王阳明十八岁时就发现此路不通，转而走入了“致良知”的世界。关于王阳明，将来在相关的地方，我们再作讨论。

朱熹与王阳明是两个极端，王阳明特别强调要用古本《大学》，因为朱熹的《大学章句》问题出在第五章。现在流传的说法是《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一章是孔子说的，后面有十章是传。传是用来解释经的，譬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但是，朱熹认为传十章中漏了一章，他就根据程颐的意思，自己加了第五章。内容写得头头是道，却都是朱熹的思想。我们也会把这一章附在书中，让诸位客观地评比。这是《大学》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虽然有些复杂，但却是认识《大学》的内容应该先具备的知识。

所以，要正确认识这本书，就要根据古本《大学》，才能不受朱熹的干扰。如果接受朱熹所编的经一章、传十章，那就必须接受他的解释，因为他的顺序与解释是连在一起的。既然不确定他的解释是否正确，就要回到古本《大学》，重新对它进行诠释，我们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接着，我们就进入《大学》的内容，直接读它的原典。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的理想，是要彰显一个人光明的德行；是要他亲近爱护百姓；是要他抵达完美的目标。知道目标何在，就会引发确定的志向；有了确定的志向，才可能保持平静的心情；保持平静的心情，才可能安于所处的环境；安于所处的环境，才可能进行周全的思虑；进行周全的思虑，才可能领悟目标的价值。外物的存在有根本部分，也有末节部分；事件

的发生有结束阶段，也有开始阶段。知道这一切的先后次序，就接近大学的理想了。

大学是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其职能是培养贵族子弟，教授他们未来从政所需的知识与能力。而《大学》这本书，则是《礼记》里面的一篇，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说明大学的宗旨与理想。

“大学之道”的“道”译成理想。“道”就是路，包括法则、规则，也包括正途（正确的途径），还包括理想。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朱熹称为三纲领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三个理想

大学的理想首先“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表示彰显；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光明的。“明德”就是光明的德行。为什么说彰显光明的德行呢？代表德行是光明的，但本来没有彰显。大学的宗旨就是要彰显光明的德行。简单说来，就是驱使人去行善。当光明的德行彰显时，就会行善。

朱熹把光明的德行解为人性本善，这样的解释并不正确。《尚书》中曾多次出现“明德”一词，前面都加一个“用”字，即“用明德”。意思是说，国君作为政治领袖要用明德，代表“明德”是我的善行，我要用它照顾百姓，用现代的词汇讲就是行善。

一个人如果没念大学，恐怕光明的德行就没有机会彰显，因为他不明白道理。《礼记·学记》中有“人不学，不知道”，就是说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不知道正路该怎么走。所以，“明明德”其实要做很多事，包括后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都是“明明德”的工作。

大学的第二个理想是“在亲民”。朱熹的解释最大的特色是把“亲”字改为“新”，新旧的“新”。为什么呢？朱熹的理由是，接下来有几段古文《尚书》的资料，其中都提到新，如“作新民”，要做新的老百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所以，第一步要让自己不断地更新，第二步是让老百姓都革新，这是念大学的理想。

但王阳明认为不需要改“亲”为“新”，他指出“亲民”是要亲爱、照顾百姓。有了德行就要行善，行善自然就会亲近百姓，照顾百姓；百姓受了感动，自然就革新了。改与不改，结论都是类似的。明明德是以善的行为表现出来，重点在于自我修养；亲民则是善行的效果。

儒家主张的“善”，是一个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要注意这个“善”的概念。如果不清楚儒家“善”的概念，就无法掌握儒家所说的行善，而误以为只是教条。古今中外不论哪个国家、社会，长辈都会教晚辈行善，老师也教学生行善，但是所有人对善的定义却不尽相同。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把善定义为“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让我们思考自己与他人的适当关系。比如年轻人在地铁上不占用老幼病残孕专座，这样老人家上车就有地方坐，还有很多年轻人主动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这就是社会教化产生的效果，大家在让座这件事上表现出自己与别人的适当关系。人我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非常重要。假设人际关系很冷漠，社会经济再繁荣，都不见得适合大众的需要。

儒家一向对人特别重视。《论语》中记载孔子在鲁国做官时，有一天下朝回家，家里的人报告说马厩失火被烧了，他只问有人受伤吗？没有问马的损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是最重要的一环，不论是马还是熊猫，或是其他任何贵重的动物，都不能与人相提并论。生而为人，大家是平等的，才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便是以这样的立场来理解善这个概念。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第一，善不存在于“我”与动物之间。这样说很容易引起养宠物者的不满，但事实上我们对动物不是“善”，而是“照顾”。第二，“善”不存在于“我”与“我”所信仰的对象之间。我与神佛之间不称为“善”，而是“虔诚”。大家要用不同的概念，描述不同的关系。儒家的“善”，只用在人与人之间。当人“明明德”之后，就要行善，受益的就是百姓。因为《大学》是教人怎么做官，做官的人行善当然是百姓受益，这便是亲民，亲近爱护百姓。在上位者行善，百姓就会效法，也去行善，不就是自新之民、革新之民吗？

大学的第三个理想“在止于至善”。什么是止于至善？“至善”一词又该如何界定？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从形式上说，至善是指完美的目标。这等于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一个目标，目前还不是“至善”，要设法“止于至善”。事实是人活在世界上，永远不可能达到至善，除非已经盖棺论定了。所以，“止于至善”就变成无限的要求。

同时，由此可知儒家并非主张“人性本善”，如果“人性本善”，试问“本善”与“至善”两者的差别何在？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差别，否则就不必强调“止于至善”？那么，这种差别怎么分辨，难道“善”还有程度吗？“人性本善”只有三分，“止于至善”是十分，人的一生还有七分要努力，这样说未免太牵强。因为善是一种“质”，不是一个“量”，“量”能够作程度的区分，而“质”则只分有无，因此我始终主张儒家讲的不是“人性本善”。而朱熹最主要的创见，就在于讲“人性本善”，但他讲的人性只是“天理”这一半，而把气质当作人性里的杂质、附属物，这种想法有他的偏见。

其次，就内涵而言，“止于至善”就是要完全安顿一切人际关系。“至善”既然是照顾别人、照顾天下人，“善”当然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善”既是我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止于至善”就是我和所有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全部做到了。在《论语》里孔子述说他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少者、还有朋友是三种人，代表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能够安顿天下每一个人。他回答子路时说最高境界是“修己以安百姓”，也就是把修养自己，最后能够安顿天下的百姓，当作最高目标。孔子说这个境界连尧舜都不见得做得到。尧舜是儒家推崇的最伟大的圣人，他们尚且如此，常人就可想而知了。

综合以上，全句的文义就是：古代的大学是要培养贵族子弟，让他们知道将来执政有了权力，要如何照顾百姓。第一，要彰显自己光明的德行，这代表受教育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德行是光明的，应该怎样去彰显；第二，要亲近爱护百姓，因为官员对于百姓，既要统治管理他们，同时也要亲近照顾他们；第三，是要抵达完美的目标。

清楚的目标引发确定的志向

知道目标何在，就会引发确定的志向，称为“知止”。“止”等同于

“止于至善”的“止”。学习的第一步是要先有认知，无知的话，就不会去实践与行动。人了解到目标值得追求，就会立定志向。

有了确定的志向，才能保持平静的心情。譬如我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填了哲学系，很多人都说哲学系将来就业不好办，使我的心情受到干扰。后来我想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路走，不需要每个人都走专门就业的路，便确定了我的志向。之后心情就很平静，安心念书。

心情平静才能安于所处的环境，在任何地方都能安静下来。古人说“十年寒窗无人问”，因为他知道后面接着是“一举成名天下知”。当然，这是比较肤浅的鼓励。

再怎么苦都能安于所处的环境，安了之后才能够获得周全的思虑。“虑”是能够对很多问题想清楚，到底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

最后进行周全的思虑，才可能领悟目标的价值。这就回到了第一点。知道目标，我才能够有志向，到最后才能领悟它的价值。前面的知道与后面的领悟不同，前面的知是因为听老师说才知道；后面的领悟是有了自己的心得。所以，得是“虑”而后所获的“得”。孟子曾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代表进一步去研究；“以道”是以适当的方法。一个君子用正当的方式，好好去深入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有心得。有心得之后，才会由内在自发去做该做的事，从被动变成主动，这是儒家教育的理想目标。所以“定、静、安、虑、得”的“得”，代表一个人真正了解，并且领悟这个目标的价值，以后就自愿去追求这个目标，而不是受他人指使勉强为之。

总而言之，“知止”就是要先了解这一生的最高目标是什么，这个最高目标，可能是外在的东西，但是所有外在的一切，最后都要归结到“善”。比如有人以追求富贵为最高目标，孔子说过富与贵每个人都想要，但是要以正当的途径得到，否则宁可不要。那么得到富贵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百姓，走到最高目标就可以安顿天下每一个人。知道最终是以“善”为归依之后，就能够有“定”，并接着达到“静、安、虑、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个“物”字非常重要，因为《大学》的